



“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

Serie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话语政治

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

刘永涛 著



Politics of Discourse:

Symbolic Power and U.S. Foreign Policy



“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

Serie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话语政治

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

刘永涛 著

Politics of Discourse:

Symbolic Power and U.S. Foreign Policy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政治:符号权力与美国对外政策/刘永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9
(“21 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

ISBN 978-7-309-10874-3

I. 话… II. 刘… III.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7250 号

话语政治:符号权力与美国对外政策

刘永涛 著

责任编辑/邬红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0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74-3/D·695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

主编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 毅（国防大学）

信 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徐以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PREFACE

丛书总序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推出的“21 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旨在深入研究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影响。

21 世纪是世界加速变化的世纪，对于美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使得美国政治机器的运行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公众和精英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大打折扣。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受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经济复苏缓慢而乏力，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贫富差距的增大、贫困人口数量的上升使得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面临巨大挑战，“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宣泄着来自左右两端的不满。美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答案只能向未来寻找。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发生重要变化。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30% 左右下降到 20% 左右，美国的国际经济优势在下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军事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削弱了美国的

战略优势。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和俄罗斯的战略复兴,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一度在国际事务中操控全球的好景不再。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可避免地逐步走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加速下滑。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将远逊于它在20世纪创造的纪录。

就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奥巴马的执政意味着重要调整的开始。奥巴马总统不仅致力于结束旷日持久而代价高昂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而且要为美国介入世界事务制定新的准则。美国要更多地依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处理外部挑战。要尽力避免在海外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面对的问题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并且这个问题是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的。美国的盟友应该加强自身力量,在处理它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新兴大国,要更多地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来影响它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开启了美国的战略内向进程。这不仅是由于两场不成功的战争的影响,而且也是基于对美国自身力量变化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思考的结果。

美国的上述变化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世界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美国研究者来说,及时、深入和全面地研究这些变化,将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美国以及世界的发展趋势;客观、准确地分析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有助于我们妥善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21世纪,中国的力量将进一步增长,国际影响力会大大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力量,如何发挥国际影响力,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需要我

们拥有开阔的视野、远见和敏锐的思维,而深入、系统地研究 21 世纪美国与世界将对此大有裨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向来注重对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的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出版这套丛书,既反映了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关注,也是要为国内美国研究界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欢迎学界同仁积极为这个平台提供相关的优秀研究成果,共同推动对 21 世纪美国的深入研究。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大家为这套丛书的成长献计献策。

吴心伯

2014 年 7 月于复旦大学



FOREWORD 前言

语言和国际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两个不同门类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不会把语言作为主要的政治分析单位加以对待。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里,话语(或者说,语言使用)如同其他社会文化概念一样,只是作为国家之间关系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附带现象而被放置在政治分析的次要地位。

然而,忽视和回避语言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乃是一种严重失误。事实上,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交织密切的联系。如果说语言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并构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国际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语言的社会。人们凭借语言进行对外政策及战略安全思考,通过它进行外交谈判,并利用它建构各种国际政治“事件”或“事实”。对语言的使用(或者误用甚至滥用)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具体的关系中,而且往往给这种关系带来复杂的政治后果。在国际关系的全部过程中,除了战争、冲突和暴力情形之外,还包含着“沟通”“对话”乃至“唇枪舌剑”的基本特征。很大程度上讲,正是有了语言并通过语言,人们

不断诠释、理解并重建着世界政治“现实”。

既然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联系密切,那么,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语言使用给予必要的关注。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在理论和经验方面取得了为数不多但颇具启发的研究成果。应该说,这些探讨是对冷战结束后重新倡导以社会文化视角考察国际关系的一种深入和拓展。因此,把一定的语言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分析乃是一项有意义、有前景的跨学科努力。随着沟通和对话日益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主流趋势,这种努力变得更加迫切和有必要。

这是一本关于符号权力和话语政治的书。它从三个层面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语言视角及话语分析,旨在为这种视角及分析的解释力和有效性提供一个基础框架。首先是哲学及理论基础层面,本书叙述了古今中外哲学思想中不同的“语言观”,并把它们视为倡导语言视角及话语分析的思想来源和一种启示。其次是概念和观念层面,书中讨论了运用语言视角和话语分析所强调的一系列概念,它们从观念上为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工具。再次是经验分析层面,本书还考察了冷战后美国政府对伊拉克、伊朗及朝鲜的政策,揭示这些政策如何在话语政治和符号权力的作用下建构了一个“邪恶轴心”世界,给中东地区和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及(不)安全环境带来更为错综复杂的后果。

本书写作得到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话语”与权力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项目编号:10YJAGJW010)和2011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11ZS10)的资

助。作者对项目资助方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部分书稿内容曾在作者开设的“认同与国际关系”课程里讲授过,并从课堂中获得具有启发性的学术反馈和评论。在此,本书作者对先后选修这门课程的中外学员表示感谢。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同意将本书纳入“21 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邬红伟同志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最后,尤其感谢妻子谢毅。她对本书写作给予了不断的支持、鼓励和理解。

刘永涛

2014 年 5 月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基本理论和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1
第一节 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	2
第二节 话语及相关概念	21
第三节 话语分析作为理论和方法	25
本章小结	37
第二章 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39
第一节 作为话语叙述的国际关系研究	40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53
第三节 拓展权力政治研究的视角	69
本章小结	79
第三章 符号权力作为政治分析的主要对象	81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的含义问题	82

2 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

第二节 身份及其话语建构	93
第三节 身份、话语与对外政策分析	98
本章小结	113
 第四章 符号权力与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建构	115
第一节 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	116
第二节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	121
第三节 “威胁”建构作为一种政治战略选择	133
本章小结	144
 第五章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话语实践	145
第一节 建构“安全威胁”: 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动员”	146
第二节 话语和抵制: 美国对伊朗政策	161
第三节 身份与安全: 重新思考美国对朝政策	169
本章小结	190
 结束语	192
主要参考文献	207

第一章

基本理论和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依赖于一定的视角。每种视角往往以一定的哲学作为思想来源,不仅设计一套基本概念作为分析要素,而且提出一定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任何有意义的视角需要有支撑其自身的哲学根基、围绕该视角而展开的核心概念,以及基本的学术观点和文本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视角也不例外。一定的语言哲学基础、有关话语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构成国际关系研究语言视角的思想来源、分析要素和出发点,从而为国际关系话语研究提供一种基本分析框架。

本章第一节对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进行必要的讨论,主要从三个来源加以叙述,它们是中国古代早期的言语观、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从这些中外哲学中产生并积累起来的有关语言思想和观点,成为把语言学引入国际关系学科、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基础。第二节对围绕语言视角而提出的一套基本概念给予适当的阐释,因为它们是话语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本章最后把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加以看待,对其进行适当的叙述和理解。

第一节 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哲学发展史上,语言一直是人们颇感兴趣并给予不断探究的对象。有关语言以及语言使用的问题,中外哲学家们都提出过独特的见解和看法。他们就语言问题所阐述的思想各具特点,既存在差别和不同的侧重,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下面主要从三个来源讨论语言视角的哲学基础。一是中国古代早期丰富多彩的“言语观”及其主要思想,着重阐释儒家“言语观”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二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侧重叙述和阐释与话语政治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即语言的含义来源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主要阐释马克思主义“言语观”中所表达的辩证法思想。

中国古代文人十分重视对语言问题的观察、理解和认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便对语言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究,形成以儒家“言语观”为代表的各种语言学派和价值观。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鼎盛时期”。^① 在先秦诸种言语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孔子算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他为代表的德行学派,把语言问题放在社会及道德的范围里加以论述,“隐然成一有机的系统”,“其语言观念亦影响深远”。^② 下面主要对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尤其是儒家的“言语观”——中的“名实论”和“言言论”加以理解,因为它们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语言问题作出的哲学及社会思考。前者主要涉及“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属于语言与实践的问题;后者则关注“语言与内在思想”的关系,属于语言与

① 唐玉环、罗昕如:《先秦语言哲学的语言价值观及影响》,载于《求索》,2009年第3期,第113页。亦参阅魏义霞:《中西语言哲学的不同特征——兼论先秦语言哲学的盛行》,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3卷第5期。

② 田标:《孔子慎言观研究综述》,载于《阴山学刊》,2009年第1期,第71页。

含义的问题。^① 它们相互联系,彼此关联,构成今天人们研究话语政治的重要哲学基础及思想来源。

首先来看名实论中有关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内容具体涉及语言与社会后果、语言与行动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里,语言被看作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社会后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缘关系。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不仅是人们从事交往和传情达义的工具,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语言是人们从事交往的主要工具,也是人与人之间传情达义、交流信息的重要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周易》里写道:“君子居其室,出言其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②君子住在屋内,若说出的是善言,便能得到千里之外的人应和,靠近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反之则不然。《周易》里还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③从语言效果上讲,君子的话会对普通老百姓构成影响,言行举止是君子品质的关键要素,它可以决定荣辱,也可以影响天地,因此,必须十分慎重才是。在这里,古人揭示了言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能对远近的人产生影响,而且还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必要条件”。^④

儒家思想强调言语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孔子说:“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⑤ 孟子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环境能够影响人的语言,因此提出把“言无实不详”“言近而指远”作为识别语言优劣的标准。^⑥ 言论若没有内容,不充实,不真实,这是不好的;

① 参阅韩东晖:《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② 此语出自《周易大传·系辞上》。

③ 同上。

④ 池昌海:《〈周易〉的话语思想》,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40页。

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路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

⑥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下),(尽心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0页;第338页。

好的语言应该是言语浅近而含义深远,所谓“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① 君子所讲的虽然是眼前近事,而道却蕴含在其中。在这里,儒家的语言哲学表现出“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及其语用学旨趣”。^② 当然,这里所谈论的言语行为主要还是就封建等级社会的君子而言的。

另一方面,语言可以是社会生活中产生是非之争、制造矛盾和冲突的因果来源。口舌被比喻为制造祸患和引起灭顶之灾的处所,所谓“口舌者,祸患之宫,亡灭之府也。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出患人,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语出不可复追也”。^③ 在这里,古人把口舌比喻为产生祸患和灭顶之灾的处所,说话与人身性命攸关,用语不当、是非随之而来,甚至引起杀身之祸,加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所以,言行举止要格外慎重。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因蔡国国君言行不慎重,导致楚国与蔡国之间发生一场战争。公元前 684 年,蔡哀侯出言调戏道经蔡国的息国国君夫人(同时也是蔡哀侯的妻妹)。息侯得知此事后大为妒恨,便求助于楚国并与楚文王一起施计,出兵夹击“败蔡师于莘”。蔡哀侯成为楚国的俘虏,受尽了屈辱。另据《左传》记载,宋国宋闵公在位,与鲁国多次交战,且屡战屡败。乘丘之战后,鲁军生擒宋军猛将南宫长万。后宋国以重金将其赎回。一次,宋闵公和南宫长万一起打猎,双方起了争执,宋闵公嘲笑其臣子:“吾初敬君,今君乃鲁国囚犯,吾不再敬君矣。”南宫长万既愧且怒,后将宋闵公杀死。

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如此重要,不仅是人际交流的工具,而且与安身立命有关,因此必须给予认真对待。这具体表现在“名实论”

①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38 页。

② 彭传华:《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669 页。

③ 刘勰:《刘子》(卷六),转引自雷平、曾亚平:《慎言与传统处世观》,载于《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16 页。

从两个相互关联方面对话与行问题的论述。一方面,言与行相辅相成,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言行不一被认为是耻辱。^①以儒家为代表的德行派把语言纳入个人道德修养的范畴里,倡导“言忠信,行笃敬”,^②主张“雅言”和“善言”,把“礼”“言无实不详”和“言近而指远”作为规范人的言语行为、识别语言优劣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说话要审慎,行动要敏捷;先把事情做到,再说出口。^③“慎言”成为儒家“言语观”里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里,“说话”和“做事”更趋于被看作是彼此分离的两种不同行为。

言言论则讨论了语言与含义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里,言和语之间存在着区别。《说文》里写道:“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④大意是说,言从口出,而意从心发。从逻辑上推理,听者对语言含义的理解也应该是由内心发出的。这里产生语言使用和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庸”,反对“过”与“不及”,那么“得体”乃是中国“古代言语准则之一”,也是儒家言语观的另一核心思想,它包括内容得体(关于说什么的问题)和表达得体(关于怎么说的的问题)。它们都涉及语言使用与语境的关系问题。对此,儒家思想提出,“辞达而已矣”的思想,即所谓言辞要能够表达意思才行。^⑤要想做到“辞达”,便需考虑交际过程中的对象以及环境。具体地讲,说话时要充分考虑

① 所谓“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篇)。

②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卫灵公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页。

③ 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篇)以及“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篇)。

④ 转引自韩东晖:《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64页。

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卫灵公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